

涌动的天下

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

李扬帆◎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09YJCGJW001



涌动的天下

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

李扬帆◎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任何严肃的著史者都无法避免反历史的倾向,因为历史叙述是对个人和集体回忆产生的想象和重构。而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重构中国近世史和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本书重新构建了1500~1911年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反观自身的观念,对基于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反应”模式下的中国近世史观提出了质疑。为此,本书对中国近世之地理观念、外交思想、对外开放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集体的世界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近世并未真正实现从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的实质性转化,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涌动的天下。

本书可供历史学、政治学等专业的学习者、研究者以及相关各部门工作者参考使用。

责任编辑:刘 睿
文字编辑:韩 帅
索引编制:贺 天

责任校对:董志英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李扬帆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0-0963-8

I. ①涌… II. ①李… III. ①世界观—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1024 号

涌动的天下

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

Yongdong de Tianxia

Zhongguo Shijieguan Bianqian Shilun (1500~1911)

李扬帆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13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2年3月第一版

字 数:1007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iurui@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56.5

印 次: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50.00元

ISBN 978-7-5130-0963-8/B·045 (384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告慰蒿儿

目 录

自 序/1

一/1

二/13

三/23

四/29

第一卷 普天之下：作为观念的世界图景 35

总论：天下观及其评价范式/36

第一节 什么是天下观：作为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世界观/36

第二节 天下观与中国的身份认同/55

第三节 叙事范式的修正：朝贡体制和“冲击—反应”模式的问题/68

第一章 世界地理观的第一期变动：新世界与帝国地理身份的完善/111

第一节 平等交往下的世界地理观/113

第二节 清帝国地理身份的构建/133

第三节 清初中国中心观之惰性/142

第二章 第二期的世界地理观：重新定位中国和西方/146

第一节 《海国图志》：“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146

第二节 徐继畲：夷夏大防观念的突破/159

第二卷 外交：他者的困惑与天下观的嬗变 171

引 言/172

第三章 被纳入东亚的西欧：他者的困惑/175

第一节 葡、西、荷、英未能冲击明朝/176

第二节	天下理由：力量优势与财政补贴下的明朝朝贡体制/226
第四章	重归天下一统：清初朝贡体制的固守与调适/236
第一节	清朝朝贡体制的新特点/236
第二节	礼制的维护和调适：对荷兰和俄罗斯的不同态度/242
第三节	心照不宣的交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背后的价值观冲突/260
第五章	天下观的崩溃：新型外交思想与外交体制的确立/304
第一节	作为沉重记忆的第一次鸦片战争/305
第二节	为外交正名：洋务派的世界局势观与外交思想/329
第三节	外交体制的变化和遣使出洋/356
第六章	天下观的崩溃：朝贡体制的瓦解与地缘战略的嬗变/387
第一节	朝贡体制的瓦解及属国战略的转变/388
第二节	重新认识海洋：防日与东亚巨变的内因/405
第三节	礼失而求诸野：颠倒的东亚与作为中国动力的日本/422
第三卷	海洋与外贸：未曾封闭的帝国…………… 439
引言	/440
第七章	涌动的天下：“海洋明朝”对朝贡体制的消解/445
第一节	禁海与海商集团：海洋明朝的产生/447
第二节	“白银世界观”：海洋明朝的过度开放性/466
第八章	涌动的天下：清朝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背后的动机与意识/477
第一节	重归中国中心主义：对外贸易管制政策背后的动机/477
第二节	涌动的天下：“贾道”与商战/494
第四卷	民族身份认同：明清世界观变迁的内在延续性…………… 511
引言	/512
第九章	身份认同：明末清初传统世界观的瓦解与重塑/515
第一节	以夷变夏：满洲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传统价值观的合理诠释/518
第二节	明清易代时身份认同与国家观念的痛苦裂变：以士大夫为例/531
第三节	在明、清与荷兰之间：郑氏家族的身份纠葛/538
第四节	南明的世界观：信仰和王朝利益瓦解了朝贡体制/546
第五节	朝贡身份认同的瓦解：朝鲜和日本对明清易代的反应/548

第十章 身份认同：民族国家的自我建构/569

第一节 中国走向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在因素/571

第二节 “排满”思想的嬗变/582

第三节 中国式民族主义中的身份构建/597

第五卷 文化：困境中的主体意识 637

引 言/638

第十一章 第一次西学东渐：文化世界观的冲突与调适/641

第一节 明末中国世界观转变的契机/641

第二节 文化世界观的冲突与调适/645

第十二章 重归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礼仪之争”与清初的世界意识/676

第一节 “中国礼仪之争”/676

第二节 想象的中国：康熙与欧洲/698

第十三章 身份认同：从扭曲的底层到大同世界/725

第一节 底层身份的迷失：太平天国和义和团/726

第二节 作为伪命题的“中体西用”论/753

第三节 另一种“中体西用”：“国粹主义”和“西学中源”论/765

第四节 走向大同：中国世界观的绝地反击/776

总结：以天下“拯救”民族国家？/794

参考文献/827

一、基本历史文献/827

二、研究类专著、专集及译著/840

三、论文及专题文章/852

四、外文文献（专著及论文）/862

索 引/869

人名索引/869

地名索引/883

后 记/891

表 0.1	汉唐宋时期朝贡体制构建一览表	78
表 0.2	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事实分歧	95
表 0.3	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主要特征比较	107
表 3.1	西方身份的塑造及其影响	181
表 3.2	中国领先于欧洲的古代航海技术表	229
表 4.1	清朝朝贡国贡期、贡道及贡物等表	238
表 4.2	1793 年前欧洲国家派往中国的正式使团表	261
表 4.3	英吉利国王致中国皇帝书（表文）的中英文全文对照表	276
表 4.4	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席百灵呈郭世勋信函中文翻译对照表	285
表 4.5	主要国家占 1750~1900 年世界生产值的相对份额（%）	302
表 5.1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所展现的林则徐等的世界观	312
表 5.2	中国和欧洲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对比	348
表 6.1	晚清主要朝贡国结束朝贡情况一览表	396
表 6.2	1895 年前中国的日本游记及著述列表	427
表 6.3	1898~1905 年东游出版物	437
表 7.1	明末流入中国的白银（单位：百万两）	472
表 8.1	广州十三行简表	489
表 8.2	胡雪岩经手的“西征借款”（单位：万两库平银）	508
表 9.1	朝鲜李朝所编中国史书一览表	555
表 11.1	利玛窦与雪浪辩论的主要观点及简评表	665
图 0.1	天下观的系统	40
图 0.2	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像结构	53
图 0.3	上古时期朝贡体制的地缘结构	72
图 0.4	唐代鼎盛时期朝贡体制区域图	81
图 0.5	朝鲜国王正朝贺表标准格式	82
图 0.6	黄仁宇的“冲击—反应”模式	90
图 1.1	佛教的南瞻部洲图	117
图 1.2	清浚地图摹本《广输〔轮〕置〔疆〕里》图 （《混一疆理图》的原始版）	119
图 1.3	《大明混一图》	120
图 1.4	《大明混一图》西南角的非洲、中东和 欧洲部分地区及其英文对应地名	120
图 1.5	《郑和航海图》局部（南京至太仓出海、舟山一带）	121
图 1.6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	125

图 1.7	《职方外纪》所附地图（亚太地区）	126
图 1.8	《四海华夷总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新建万尚烈等刊本）	133
图 1.9	《皇輿全览图》局部（详细而准确的山东半岛）	141
图 6.1	滨下武志的中国朝贡体制图	398
图 6.2	兴中会会员谢纘泰据英国报纸的信息绘制的《满清时局图》	399
图 7.1	16~18 世纪世界白银的流向	473
图 8.1	雍正七年至道光十七年粤海关关税及贸易量统计	501

自序

反思中国之近世历史对中国的未来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①惜乎我们没有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向前可以看多深决定了我们向后可以看多远。龚定庵尝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②此论可谓振聋发聩。长期以来，以“欧洲中心观”和“东方主义”为基调的近代史叙述几欲使中国失去历史，也差点使世界失去历史的多样性之本来面目。龚自珍命题的另一面，则是欲立其国，必先立其史。时代已经走到一个新的转捩点，欧洲中心论已经不能解释世界历史，^③而欲了解世界，必先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不自觉地受到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

本书所谓的世界观，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义，即“个人或集体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观念的总和”。^④因此，这里的世界观不是指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那个世界观。本研究之世界观实为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总的观念和对自身认识的总和。更狭义的理解，“在这里，世

① 近世 (recent) 和近代 (modern) 在语意上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倾向于“能指” (the signifier)，后者倾向于“所指” (the signified)。而“近代”的所指寓意复杂，往往带有强烈的某种价值——通常是基于欧洲历史的——判断标准，“近代”概念认为只有发生了类似欧洲发生的历史过程才能称之为“近代”。鉴于此，本书宁愿选择“近世”这一更多强调时间性而更少强调价值判断的概念来表述191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见《龚自珍全集（上册）》，王佩净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③ 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认为：“这个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完全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亚洲可望再次兴起。”（[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同理，深受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影响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也不足以提供中国应对世界巨变的观念体系。

④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8, Vol.16, p. 576.

界观指的是关于政治世界的理论构思”。^①

传统意义上而言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下观”。它首先是对空间即对世界地理和中国所处地理位置的认识。其次是文化世界观，包括对世界体系的总的观念、制度和秩序的意识以及对中国文化所处地位的认识。文化世界观是价值观中的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核心要素。虽然“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因此而令学者们害怕”^②，但是离开文化谈世界观必然导致意义的缺失。此外，经济的开放观以及民族观均构成中国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观念都和中国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相关。世界观是观念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③因此，总结和思考中国在走向近代或现代之前传统世界观的变迁，必然结合其具体的社会行为——天下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观念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而不能仅仅是在概念之间进行推演。总结中国天下观的变迁历史，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将中国推向必须阐明自己对世界的总的想法和构思的时候，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价值体系？——除了经济成就。时代逼迫中国作出回答，因为这是中国将来可能处于领导地位时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本书通过对1500~1911年中国世界观变迁的梳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重建这段历史的完整性，揭示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的自发过程。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中国，其与欧美历史最大的不同，恰恰是中国曾经具有一个宏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天下观”的和谐哲学），它既非欧美的帝国体系（基于权力的控制哲学），也非欧美的民族国家体系（基于“丛林”论和进化论的竞争哲学）。中国天然地具有构思世界如何相处的历史记忆和思维基因。^④“从语言的角度说，‘世界观’是一个西方的而且主要是德国的概念，假如按照我们的习惯，中国的世界观就必须被称为天下观（原文为粗体——本书作者注）。而天下观所强调和突出的正是世界观的政治性。天下观可能是惟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在天下观的基础上，我们最

①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② [美]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③ [英]约翰·伯瑞（John B. Bury）：《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④ 历史编纂是一种和权力、控制等紧密相关的集体记忆的需要，“自现代人起，构建一个社会记忆成为了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忆的争斗，在社会记忆为口述记忆的社会里或在书面的集体记忆正在形成的社会里最容易被别人所掌控”。[法]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历史与记忆》，方仁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能够全面充分地构思世界的世界观”。^①

然而，这种中国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和思维基因却因近代以来的断代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自发过程之叙述出现紊乱。民国时期对近代史的分期已经定型。“国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每以葡借澳门以前之交通史为界；研究中国外交史，每以鸦片战争而后之外交史为基”。^②带有时间上的“断代”性质和空间上的“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的编撰，那是20世纪初的事情，大概可从1909年北京汉英图书馆印刷的陈光宪的《中国近世史》算起。^③

选择何种时段去重构历史叙述，绝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它直接反应了叙述者的一种价值倾向。鉴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朝代循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被笼统地归化到断代史的范畴。于是，中国世界观的延续性被“明朝—清朝—中华民国”这样的断代叙述人为的隔断。事实上，中国近世历史因朝代更替出现的断代现象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发生了观念和思想意义上相应的本质改变。明清两朝与世界的关系所展现的中国世界观的变迁与这两个朝代的更替并不必然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

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倡一种“长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历史都把过去的时间分解成不同的时段，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段进行研究。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已使我们习惯了它那匆促、紧张的情节叙述”，“在历史时间的种种不同形式中，长时段是一个棘手、复杂和陌生的任务。把长时段接纳到史学研究中来不是件好玩的事。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研究和兴趣的范围，也不是仅仅对史学研究有利的一种选择。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④不过，通过否认历史时刻的历史性其本身还是在力图展现历史时刻的重要性。“任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通过设置边界来确定自己的主旨”。^⑤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选择1500年作为论述中国世界观变迁的起点也可称为是力图构建一个大近代史观。作这种选择，并非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某个特定的具有历史影响的事件，而是在这一年前后，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1500年开始……”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

①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②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序篇，第1页。

③ 郭世佑、邱巍：《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2页。

④ [法]布罗代尔（F. Braudel）：《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第182页。

⑤ [美]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韩震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界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①此外,也有中西交流学专家对中西交流的历史之起点定位在这个时间段。^②

“随着16世纪西方各殖民帝国的到来,新儒学以及中国思想、政治、经济、宗教和艺术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都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如儒家宋代的先驱们回应中古佛教的挑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寻求弥缝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同西方的对抗”。^③这种对抗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然而,新儒家的兴起仍然属于中国文化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产物,其思想基础和核心价值观仍然是中国本土文化。

历史叙述的时间段之选取,也并非一定具有特定的意义。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作者开篇宣称:“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④然而,作者叙述的小事却反映了大问题,所谓见微知著大抵如此。小约翰·威尔斯(John E. Wills)以其隽永细腻的笔触,在其《1688年的全球史》中,“使我们获得一种最大程度的和谐和智性上的明晰”。^⑤当我们将历史叙述的起点确定为某一年的时候,“必然难以摆脱揣测的意味。尤其是因为我们试图描述的是生活在1688年的人们。虚妄的成分会远远大于描述当代史的某个年份。纵便是‘1688年’,当年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民族也不会这样称呼它:对于穆斯林人来说,它是1099年,接着是1100年,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康熙二十六年,尔后是康熙二十七年”。^⑥他也宣称: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 David E. Mungello (孟德卫),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在此书的开篇,孟德卫对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他提出1500~1800和1800~2000两个模式。他认为在前一个阶段,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尽管双方的交流并不平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但后一个阶段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施加影响。

③ [美]白诗朗(John Berthrong):《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彭国翔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④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⑤ 朱孝远:“小约翰·威尔斯的世界图像”,见[英]小约翰·威尔斯(John E. Wills):《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推荐序,第5页。

⑥ “巴洛克序曲:1688年1月3日”,见[英]小约翰·威尔斯(John E. Wills):《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1688年是康熙二十七年,作者在此有误,回历无误。

“1688年的大清帝国，天下太平，境内并无战事。”^①后人对前人的历史叙述，自然充斥着后人的选择性。

对1500年的选择仅仅意味着确认了16世纪开始的时间意义，仅此而已。但整个16世纪则可以成为描述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特定时期，因为从国家、政治、文化等单元而言，自这时期以来的交往和交流大大加速了人们对“整体”单元的定义（国家、政治、文化单元）。“通过边界来定义现在或者群落，也就是把它们看做一个内在的、有别于他人的整合，这种定义恰恰成为对他性的思考手段。一个群落如何相对于他族被定性，这种定性模式能够从此成为人们思考他人的模式。这样一来，每种文化或时代所特有的结构化意念是它们交汇时产生的效果，也是每一个群落相对于自己来定位他人的工具”。^②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说并非意味着世界史从1500年才开始。在放宽视野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种“世界历史”的叙述范式：第一种即通行的传统范式，认为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才有世界史。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述方式。另一种采取平行描述的方式，认为欧洲对世界的扩张只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等同于世界史。中国在此前和亚欧其他民族共同构建的世界历史早已经非常活跃。早在1949年，张星烺即指出：“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15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在15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可忽视亚洲与欧亚之间的活动。”^③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矫正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即便1500年以后的世界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最初的200多年（16~18世纪），欧洲只是帮助中国强化了、固化了中国既存的书写世界史的天下观念。中国自行构建的世界史一直存续，并将欧洲卷入中国的世界

① [英]小约翰·威尔斯（John E. Wills）：《1688年的全球史》，赵辉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② [法]米歇尔·德·赛尔托（Michel de Certeau）：《历史与心理分析——科学与虚构之间》，邵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③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弁言，第1~2页。惜乎张星烺的思想囿于当时仍处于风头的欧洲中心论，而至认为“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渐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第3页）。且此书是其教案结集而成，于某些历史事实之考证也有不准。如，认为1523年葡萄牙人不得志于广州之后，“北至浙江宁波（Liampo）”，按，此“Liampo”绝非宁波。1832年，龙思泰即考证认为，“Liampo”并非“Ning-po”（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经常提及“Ningbo”，即宁波，从来不用“Liampo”，“L”和“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声母，作为拼音文字，无论拉丁文还是英文，都不应该搞错。东印度公司提及宁波的地方参见H. B. Morse, “Letter from King George III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225, 249, 251, etc.另，张星烺还将与西班牙人作战的海盗林凤和另一个海盗林道乾搞混了（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第9页，第124~126页）。关于林凤和林道乾，参见本书第二卷第三章的相关注释。

观。“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是它的组成要素之一。换言之，欧洲也是其组成要素之一”。^①

极力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弗兰克非常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白银资本》中，他认为：“历史的连续性远比任何不连续性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弗兰克反对认为1500年左右世界历史发生了断裂的说法。他指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所谓以1500年为界的前后之间的断裂”，“与所谓的断裂或新开端相比，贯通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更为重要得多”。^②的确，历史的连续性正是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提出1500年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欧洲中心，而是从中国与欧洲交往的事实角度去重梳1500年以后至晚清结束的历史，消解传统上的明清断代及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等观念。1500年本身没有特定的意义，只是1500年之后中外交往中发生的事件具有历史意义。

葛兆光说，鉴于中国“对整个文明的信心的崩溃”实际上发生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我把16世纪以后到19世纪晚期——以1895年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年代——看成是思想史的一个新的时段，因为，当16世纪中国进入世界以后，思想史就再也不能不考虑全球的因素”。“明清鼎革，朝代变换，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文明的断裂，不过，在历史时间的深层，文明自身依然在延续。进入17世纪，虽然紫禁城里的皇帝从汉族变成了满族，但是上述两种策略始终没有变化，而在这两种策略中，中国保持着平静的心情，从17世纪到18世纪，从18世纪又到了19世纪，只是在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深处，那些曾经挑战并震撼了中国的西洋文明在蛰伏着，时时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忆，隐隐约约地成为知识与思想的潜在资源和背景，常常掀起阵阵知识与思想的波澜”。^③

此外，本书将重点放在16世纪后期的晚明（1582年前后开始）和19世纪后期的晚清，是因为“从晚明看晚清，或者反过来，从晚清看晚明，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对话’关系”。“如果说30年代发现了‘五四与晚明’，80年代注重‘五四与晚清’，那么，今天想努力发掘的，是同样很有学术生长点的‘晚明与晚清’”。^④

① [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②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页，第436~437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448页。葛补充说，1895年之后直至20世纪初，均属同一个时代。

④ 陈平原：“从‘议程表’说起：在‘晚明与晚清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见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附录，第617页。

从对外观念的角度研究中国世界观变迁的最初动因，是因为之前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研究不假思索地接受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然而终结这种现象谈何容易。^①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研究分别隶属于外交史（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领域。是否可以探求一种将中国外交研究超越既存的学术分工的范式，并借鉴更为广义而渊源极深的汉学的智慧，通过历史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学）的整合，从而实现一种综合研究范式呢？有人对基于历史学研究范式的中国外交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研究：其一，所获的知识常为研究者个人洞见，不易客观验证；其二，欠缺理论指引而不易系统化累积知识；其三，研究仅是历史过程的重建；其四，不讲究方法论而有过度诠释的现象。^②然而，社会学科（或科学）的研究又有几个体系能够真正得到所谓的“客观验证”呢？能够做到自圆其说、逻辑通顺已是不易。

“知识的展开之为一个整体不能被任何个人所掌握，这一点足以说明我们放弃纯粹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即不要任何理论抽象的纯粹历史描述。因为纯粹的历史过程是不可理解的。‘有效的历史（effective history）’只能是被理解了的历史。而任何个人在任何特定角度上所理解的历史，只能是整体知识叙说中的沧海一粟”。^③同时，在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综合研究的领域，本身就没有所谓既存的理论指导，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积累。而所谓“历史过程的重建”和“过度诠释”则属于现代历史学的本职工作，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重建，凡诠释

① 尽管最近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现代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确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在时间上，其学术思想的渊源并未突破16~17世纪的政治学阶段，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观念、霍布斯自然状态概念及黎塞留国家理由（理性）等引申出来的一系列观念仍然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二是从空间上而言，尽管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流行理论范式对基于欧洲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了重构，并且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成就，然而它们惟一欠缺的，是这些理论的奉行者没有一个是国际问题专家或汉学专家出身。并非一定要是中国问题专家或汉学专家出身才能称为称职的国际关系学者，而是说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并不合适的逻辑：中国因为实际地位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处于被动状态和非秩序构建者的位置，从而导致中国被忽视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力量不济导致文明价值被忽视的现象。同时，也或多或少说明了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发明者们的短视。既然是流行的，那就肯定不是长远的。中国的崛起或许已经引起国际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重点关注，然而显然地，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仍然远远地落后于国际关系变化。并且，由于长期对东方关注的欠缺，欧美的国际关系学甚至远远地落后于国际汉学和世界历史学。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理论不能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不真正关注一下中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书也并不赞成构建所谓“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的设想，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定位应该是超越国家的，它应该对天下予以真实的关怀，恰恰中国学者应该最不缺乏这个学术和文化基因。换言之，尽管当代流行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其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学，因为它们并没有将历史上曾经真正存在过的国际关系学——以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精华进行如实的研究，并且它们无一例外地仍然将民族国家当成是核心的行为体。而中国的传统国际关系学可能是几大文明体系中惟一存在过的真正的国际关系学。将来，一个有成就的国际关系学者一定是一个对东方——不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和日本——洞察至深的学者，而不仅仅是基于美国的力量优势因而仅仅奉美国的学问为主臬的跟从者。

② 明居正：“中国外交史分析架构之再思考”，载《政治科学论丛》1995年第6期。

③ 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必然“过度”——诠释时无法确立深度标准。因此，在这本拥有2 700多条注释、引征文献资料1 300多件的“过度诠释”的书中，我仍然固执地尝试了一种综合研究的路数。所以，它既非历史学的，也非政治学的，这就是本书所冒的风险：它既可能不被正统的历史学所承认，也可能不被主流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所承认，而汉学和哲学对此也可能嗤之以鼻。这种边缘化的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是对选定的一个主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在最低标准上而言，它要对所有关于中国对外世界观的主题进行的研究（历史学、政治学、汉学以及哲学的）予以借鉴，并对研究所涉的时间段的主要的思想、政策和战略的文献进行综述。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更接近新史学研究中的“观念史”或“概念史”研究^①，但又不仅限于此，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天下”“朝贡体制”“大一统”“开放与封闭”“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等概念在近代及以前的语义上的演变过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其具体的历史表现即社会行为的角度进行历史性的梳理。

从学科的意义而言，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基于“民族—国家”体系，因此很难说真正具备了“世界理论”。赵汀阳认为：“怀特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多少是有些误导的。因为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国际性’难题而是‘世界性’难题。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区别远不仅在词语上，它直接关系到问题的分析框架以及对辨别关键问题的方法论。国际性不仅处理不了世界尺度的问题，而且还遮蔽和歪曲了世界性问题。除了通常政治理论框架中的国家内政理论（domestic theory）和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我们有理由说，必须加上**世界理论（world theory）**（原文为粗体——本书作者注），它对于政治理论体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如果没有世界性视界，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在世界性的全盘视界中，世界的政治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理解。”“天下体系”理论的“框架和方法论非常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哲学。首先，从理论框架上看，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做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与之不同，西方政治哲学（以当代政治哲学为准）中没有‘天下’这一政治级别，国家（民族/国家）已经被看做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它的政治问题优先排序是‘个体—共同体—国家’。西方政治

① “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见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第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页。